

青少年读书俱乐部推荐图书

文仲
编

1971年的故事

百年历史回眸

陕西旅游出版社



青少年读书俱乐部推荐图书

百年历史回眸

陕西旅游出版社

目 录

大庆 1205 队一年钻探突破 12 万米	(1)
美推行印支新战略	(2)
美国想在印支使用核武器	(4)
美经济专家就任财政部长	(5)
林彪的《“571”工程纪要》	(10)
全力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斗争	(15)
苏联发生“台尔曼号”事件	(16)
日本冲绳的全岛大进军	(17)
苏发射成功“礼炮号”空间站	(19)
林彪不理毛泽东	(20)
尼克松宣布访华	(21)
日本要求美国全面归还冲绳	(23)
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	(24)
民众反对日美“归还冲绳”协定	(27)
国家发布计划生育政策	(28)

“我们该是半个亲戚”	(29)
巴黎成为中美联络站	(34)
西汉中山靖王墓出土	(36)
我成功创造针刺麻醉新技术	(37)
美国工人大罢工	(38)
罗杰斯推行“两个中国”论	(40)
毛泽东顺利回京	(43)
美推行新经济政策	(45)
“保钓运动”在台湾	(47)
“西柏林协定”正式签订	(48)
林立衡有心计	(50)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病逝	(53)
林彪摔死了	(55)
好个“不成功便成仁”	(60)
我国胰岛素研究又获重大成果	(63)
日本第一劝业银行成立	(65)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全面恢复	(66)
“让乔老爷当团长”	(71)
中阿分歧公开化	(76)

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	(77)
美国军民游行示威	(78)
尼克松特使在拉美遭抗议	(81)
乔冠华成为联合国的明星	(83)
我代表发言“震动了联合国大厦”	(88)
孟加拉国成立	(93)
毛泽东患病	(98)
南克罗地亚发生民族骚乱事件	(100)
波兰推行“高速发展战略”	(102)
美国间谍分子获得我从宽处理	(104)
周恩来受命于危难之中	(105)
《春之祭》在法国首演引起了轰动	(110)

大庆 1205 队一年钻探突破 12 万米

1971 年 1 月 1 日零时,大地冰封,寒风呼啸。在 1205 队的井场上,队长王作福在一片欢腾中大步登上钻台,他代表全队宣誓说:我们要把 60 年代登上的高峰作为起点,向前更迈进一步。新的一年,1205 队的具体奋斗目标是,日上千(米),月上万(米),一年钻进 12 万(米),王作福的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一年钻进 12 万米,这是 1205 队全队工人们强烈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队人员以老队长王进喜同志为榜样,克服重重困难。一月份的大庆,正是滴水成冰的日子。一天晚上,正赶上起钻,泥浆倒喷,钻台上的同志们满脸泥浆,浑身湿透。就在这时,备用的清水池被冲垮了,水流直向旁边的泥浆池里灌,如不及时堵住,就要影响泥浆质量,耽误正常生产。大地,冻得比石头还硬,用镐刨土来堵已来不及了。共产党员李贵、华广忠,立刻跳进齐腰深的水池里,用身体堵住缺口。刺骨的寒风吹来,冻得他们浑身发抖,他们仍然顽强地坚持着,直到把缺口堵好。当同志们把他们拉出来的时候,棉工作服上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为了摸索打 12 万米的经验,这个队早在 1970 年就专门组织了一次“月上万米”的演习。但是这次试验由于没有很好掌握住地层情况,第一口井足足打了 6 天,比原计划多了一倍的时间。为了提高老式钻机的速度,工人们

反复实践、研究，一套高速度、大排量、大钻压的快速钻井新工艺，在英雄的 1205 队诞生了。

1205 队的工人们始终把严格的科学精神贯穿在打 12 万米的每一个具体环节上。1971 年 12 月 7 日，英雄的 1205 钻井队终于实现了铁人老队长生前没有实现的愿望，打出了 70 年代的钻井新水平——一年钻进突破了 12 万米。

美推行印支新战略

1971 年 1 月 8—11 日，美国国防部部长莱尔德在西贡进行了 4 天的“视察”，同侵越美军头目及西贡傀儡集团头目举行了一系列会谈。

莱尔德是在美国推行战争“越南化”计划的同时在印度支那战场遭到惨重失败的情况下，赶到西贡等地活动的。在去年一年中，美军及其仆从军在印度支那战场上被歼灭 60 万人。它在军事上的不断失败，进一步加深了它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自感朝不保夕。莱尔德此行一方面安抚仆从军，同时进行新的侵略部署，以便继续推行战争“越南化”计划，进一步强化侵略战争，来挽救“尼克松主义”的破产。

莱尔德在西贡和曼谷许诺美国将加大该地区的“军事援助”，“加强”它们的“军事能力”，推行美国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用印度支那人打印度支那人”的罪恶计

划，以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和印度支那的殖民利益。

莱尔德顽固地拒绝立即无条件地完全撤走美军，而以所谓的美军的最后撤退“需要较长的时间”为由，继续玩弄点点滴滴撤军阴谋，使大批侵略军驻留越南南方，这就暴露了美国的顽固和凶残的面目。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莱尔德在西贡同美国高级军事头目集中讨论了“越南和老挝的军事形势，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等问题，特别是“讨论柬埔寨日益恶化的残局”，策划了挽救朗诺集团的计划。在莱尔德到达西贡的前一天，侵越美军副司令韦安德在7日专程前往金边同朗诺进行会谈，以了解莱尔德所需要的材料。8日，莱尔德又派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杜林匆忙赶到金边，“研究柬埔寨的军事形势”。12日，美国参谋部部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又前往金边进行侵略部署，以便使朗诺集团“了解由于莱尔德访问西贡而引起的局势发展”。穆勒在金边叫嚷，“美国将十分密切地注视着柬埔寨局势的发展”，对柬埔寨爱国军民进行战争威胁。此外，莱尔德还将派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杜林去万象进行活动。

莱尔德的西贡之行表明，内外交困的美国正在进行垂死挣扎，妄图靠新的战争冒险来寻找出路。但是印度支那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印度支那人民，不管美国要什么样的花招，都挽救不了它失败的命运，只能加速它的灭亡。

美国想在印支使用核武器

1月18日，瑞典《晚报》记者埃里克森写了一篇评论，揭露美国妄图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评论说，尼克松政府可能把一种新式的“有限”威力原子弹用于印度支那战争，作为军事绝望尝试。早在1966—1968年，美国就在讨论越南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后来由于遭到国际舆论的激烈反对而搁置。自去年秋季以来，美国最高领导方面又在重新考虑在印度支那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当前许多情况表明，这一讨论已接近下决心的阶段。

评论说，人们认为，去年11月份的《纽约时报》刊登政治评论员苏兹贝格关于《核武器与印度支那》一文以及美国其他报纸类似的报道，是白宫发出的探测舆论的气球。人们均把美国政府贬低核武器威力的尝试，看作是在印度支那使用原子弹所作的舆论准备，以防使用原子弹以后导致大规模的国际冲突。

评论说，美国许多获悉内情的科学家和政治家们对此感到极大的不安。这些政治家的一部分代表四处奔走，寻求与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进行接触，以动员国际舆论制止这一疯狂行径。

评论还说，美国这些政治家有的来过瑞典，《晚报》与他们有过接触。



美经济专家就任财政部长

1972年1月，尼克松任命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康纳利为财政部部长，随后不久就指定他为政府经济问题首席发言人。

尼克松声称要实现“没有战争的繁荣”，但是在他任期内失业、通货膨胀和美元危机三大问题愈演愈烈。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经济由60年代开始的高速增长，转为70年代的低速增长，既由世界经济的大气候所致，也与尼克松的民主党前任所推行的“货币政策和预算政策”及越南战争有关。尽管尼克松可以把责任都推给肯尼迪和约翰逊，但他不能回避现实。美国人是讲究实际的，作为总统无论他在外交上取得多么辉煌的业绩，如果国内经济滑坡，影响人们的生计问题，他照样会被选民抛弃。对尼克松来说，总统职位来之不易，他可不想仅仅因为经济问题而使自己下一次大选中成为“跛脚的鸭子”，因此，他必须在保持外交强劲的优势的同时，尽量在治理经济方面拿高分。

可是，律师出身的他一直混迹于政界，没有经商理财的专长，对此他有自知之明，所以竞选时只刻意打结束越战的招牌，然而选民投他一票，实际上是寄予他双重希望：停战并带来经济的景气。而改善日益恶化的美国经济并非易事，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由一批学有专长的人去操纵它。鉴于此，尼克松在组建政府的同时，在

有关部门和白宫内部安排了一批为他出谋献策的经济学界人士。其中与他关系密切对政府的政策影响较大的有两位，一位是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另一位就是财政部部长约翰·康纳利。

伯恩斯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专家，曾在拉特格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53—1956年他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关于经济问题的辩论中，与当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是站在一边的，故被尼克松引为同路人和知己。1968年大选，他在尼克松的竞选班子里任首席经济顾问，不久被任命为总统顾问兼白宫内政政策协调人，成为政府在内政方面的各有关部长的实际上司。1969年秋，尼克松让伯恩斯离开内阁，委他以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重任。

正如埃利希曼所言，尼克松的这项人事任命用意颇深。美国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利用各种手段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这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任务。而联邦储备委员会又可以不受总统约束，有权采取独立行动，甚至同总统对抗，许多总统为此感到懊丧。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提高或降低本系统银行储备金的百分比，结果是经济生活中的某个方面的银根紧缩，而另一方面则银根松弛。它还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本系统银行和其他债务人的借款利率来操纵信贷。利率越低，贷款越容易；人们就会利用利率低的时机借款，结果使经济生活中货币供应量增加，需求更大，对经济的刺激也就更大了。反之，利率越高，贷款越困难，经济



生活中货币供应量减少,需求就小,结果经济发展就缓慢下来。另外,它通过购买和销售政府债券也对经济发展进行类似的干预。当它买进证券时,各储备系统银行就减少其储备(这种储备是以政府证券形式出现的),储备系统各银行手中就有更多的钱借给别人。于是,货币供应量就增加,经济就上升。当它售出证券,联邦储备系统各银行手中的储备就增加,用于贷款的钱就减少,经济发展就缓慢下来。鉴于联邦储备委员会对美国经济可以施展这种魔术般的力量。尼克松深信,联邦储备系统的金融政策是国民经济的关键,他决心控制联邦储备系统。但当时担任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是来自东部的银行家,他在这个职位上为5位总统干了18年多,他的任期到1970年1月结束。尼克松认为,马丁墨守陈规,自以为完全独立于尼克松政府,独立包揽了全国的货币政策。如果任其这样下去,尼克松觉得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处理国内的经济问题,因此,他必须让自己的人担任联邦储备系统的头目。

几乎不经犹豫,尼克松就决定由伯恩斯来接替马丁。伯恩斯在经济问题上的政策主张与尼克松同属保守派,他长期反对民主党自由派的“大政府”主义,即反对联邦政府增设机构,包揽种种社会经济事务;主张权力下放,把一些社会经济事务移交给州和地方政府去办。他强烈主张削减联邦政府开支,控制通货膨胀。尼克松很重视这些见解,认为伯恩斯不但具有高超的智力,而且恪守一条重要的原则:“讲总统需要听的话,而不是只讲总统爱听

1971 年的故事 ★

的话。”还有就是，给历届总统当顾问的经济学家们，总是不顾政治现实，而伯恩斯既是经济学家，又是政治家，这点最合尼克松之意。

开始时，尼克松对伯恩斯寄予厚望。尼克松向伯恩斯许以其他很多高级官员都得不到的优惠待遇。他一方面要控制联邦储备系统，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它不受任何政界人士（包括他自己在内）控制的形象。因为按照法律，联邦储备系统应该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不受国家中所发生的任何政策变革的冲击。但是，尼克松认为他不能缺乏某种对付联邦储备系统的手段，否则他在处理国内经济问题上将难有作为。他公开地说：“我知道，有人说联邦储备系统是独立的，这只不过是个神话……”考虑到参议院在讨论是否批准对伯恩斯的任命时，可能会有某个参议员提及伯恩斯与总统的私人交情，尼克松叮嘱伯恩斯注意影响。为了控制联邦储备系统，尼克松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教训甚至训斥伯恩斯，要他采取行动放松货币供应，少与总统唱对台戏，然而伯恩斯从未真正受过尼克松的控制。

到 1970 年底，尼克松治理经济收效甚微，反通货膨胀不成，反经济衰退也无效，政府内部在经济问题上分歧很大，莫衷一是。伯恩斯不顾劝阻，对外大谈实行控制工资和物价的“收入政策”的必要性，让尼克松十分为难。共和党在这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失利，让尼克松不得不对局势感到担忧。既然像伯恩斯这样的经济专家不能管好美国经济，那么必须赶快另换人马，别谋对策，否则他谋求

1972年竞选连任总统就无望了。面对伯恩斯和联邦储备系统给他制造的许多麻烦,尼克松需要一个政治上强有力的代言人。在这之前,他早就抱怨说内阁中没有一个人能信心十足地谈论经济,没有一个人能到电视上去发表讲话,他盼望有一个能代表总统的经济发言人以统一白宫的口径。1971年1月,尼克松任命了康纳利为财政部部长,指定他为政府经济发言人。

尼克松的这项人事任命不是单纯地从经济方面作考虑,他的更深的用意在于政治方面。康纳利作为民主党的显要人物同时具备地方实力派和华盛顿政坛老手的特长。在此之前,他利用得克萨斯州这块民主党阵地多次与尼克松为敌,使尼克松在1968年总统大选和1970年国会中期选举中丢失不少选票。另外,他曾为约翰逊服务过几年,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在华盛顿官场的根基比较雄厚,因此把属于民主党的康纳利引进内阁,对尼克松是有利无弊。首先,康纳利本身所具备的素质和才干能为尼克松所用。尽管他是出身律师,但没有管理经济的实际经验。康纳利早年曾替得克萨斯石油大亨锡德·理查森充当法律顾问,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行情比较熟悉,后来又3次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积累了管理一个大州经济的实际经验,加上他精力充沛,大胆果断,长于谋略且能言善辩,是尼克松理想的财政部长人选。其次,尼克松认为,让康纳利来主管政府经济事务,有可能创出一条新路子,因为康纳利凭其在民主党中的地位 and 影响,能使国会顺利通过各种经济法案,这是任何一位共和党人出身的财



政部长所望尘莫及的。在经济处于最低点的时期，尼克松确实需要借助他与康纳利之间的联盟来度过 1972 年竞选连任这一关。再次，吸收康纳利入阁，重要的不在于粉饰白宫门面，而是在于分化瓦解民主党的力量。康纳利不但可望为尼克松带来得克萨斯州的 26 张选票，而且还可能争取到南方其他各州的选票。

康纳利上任后，代表尼克松主持处理国内和国际财政、金融事务。针对国内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国外的美元危机，他向尼克松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个康纳利方案就是后来公之于世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为 1972 年尼克松竞选连任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克松启用康纳利是他走的一着妙棋。

林彪的《“571”工程纪要》

2 月 12 日，林彪、叶群携林立果视察苏州，决定叛党叛国，发动军事政变。同时指使林立果进行秘密串联，建立反革命政变基地。促使林彪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毛主席在最近的军委会议上谴责了林彪反党的立场，并改组了北京军区。林彪感觉到他的叛党阴谋已被毛主席发觉，于是准备孤注一掷。

林立果在空军的正式职务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同时兼任作战部副部长。



2月21日傍晚,林立果窜到杭州,和空军司令部副处长于新野一起多次与陈励耘密谋反革命政变计划。

3月21日下午,林立果、于新野、许秀绪、周宇驰、李伟信等人在上海巨鹿路一幢楼房召开秘密会谈。他们认为,“目前首长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他们同时研究了林彪“接班”的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二是被人抢班。三是提前接班。林立果说:“办法是搞掉B—52(他们称毛主席的代号)。”慑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他们对这事有些心虚。最后议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目前,主要有两件事要做,一件事是要成立“教导队”;另一件事便是根据林彪的意思,定出武装政变的计划来。按照林立果的主意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决定把武装政变计划定名为“‘571’工程”。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

3月23日上午,于新野起草好了《“571工程”纪要》。

《“571工程”纪要》共分9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纪要》认为,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而“B—52”“对我们不放心”,因此,“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要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以便“推翻挂着社会主

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或“夺取全国政权”或造成“割据局面”。《纪要》认为，“经过几年准备，在组织上、思想上、军事上有许多提高，具有一定的基础”。可以“利用上层集团，一网打尽”或者“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一种导弹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来达到目的。在保密和纪律中强调，“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成功，便成仁”。对泄密者、失职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正当林彪一伙秘密准备时，党中央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了林彪一伙一统军委办事组的局面，并于4月15日，召开了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共99人参加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会上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书面检讨。林彪在北戴河呆不住了。4月19日，林彪与叶群一同坐飞机回到北京。林彪要在北京“坐镇”，以稳住他那一方人的阵脚。

“联合舰队”了解到汇报的情况，也坐不住了。决定“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施“571工程”的计划。

就在林彪一伙在各地建立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这次巡视毛泽东会见了各地的党、政、军领导人，而将林彪这一伙完全排斥在外。林彪对探听不到会谈内容